

美国公众对华态度中的内群体偏好与党派效应： 社会认同理论的应用与检验

徐迪^{1,2}, 黄莲丽¹, 郑韶武³

(1.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部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 湖北武汉 430074;

2.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3. 人民日报社《国家治理》杂志, 北京 100733)

摘要:近年来, 中美战略博弈更加激烈, 美国对华战略日渐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美国公众的中国威胁感知呈现何种状态, 对中美关系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寰球民意指数”(2023)调查数据为基础, 探究美国公众中国威胁感知, 以及其如何受到内群体偏好、中国实力认知、党派差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分析发现, 美国公众的中国威胁感知总体较为复杂,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美国公众中国威胁感知差异较大; 中国实力认知在内群体偏好影响中国威胁感知中起到中介作用; 党派差异调节了内群体偏好透过中国实力认知作用于中国威胁感知之间的中介关系, 且对执政党的民主党人士而言, 党派差异与中国实力认知的交互调节作用更为显著。上述研究从社会心理层面拓展了美国公众的中国威胁感知的形成机制, 通过关注美国国内的民意态度有助于预测美国政府对华战略, 以研判中美关系的走向。

关键词: 美国公众; 涉华民意; 内群体偏好; 党派差异; 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 D822.2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5) 01-0002

-13

自2012年以来, 美国全球战略逐渐从主导地位转向更为保守的角色, 其国际事务中的参与策略变得更加谨慎与具有选择性。^[1]与此同时, 中国的对外战略呈现出明显的积极主动倾向。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外交政策举措, 旨在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并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这种战略转变在国际关系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 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2]

进入21世纪以来, 中美两极化格局初露端倪,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合作和迅速增长的国家综合实力已在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与美国形成竞争摩擦。这种竞争态势在中美实力对比与

战略选择的同时变化中不断深化, 引发了所谓的“共振”效应。^[3]所谓“共振”效应, 是指中美之间的互动不仅仅是单一领域的对抗或合作, 而是一种复杂的相互依赖和影响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的变化对双方的战略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也为中美关系的演变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在拜登政府期间, 中国被继续定位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之一, 并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4][5]}然而, 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揭晓, 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新政府上台后, 其执政策略依然表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和保护主义倾向, 强调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国家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的百年传播研究”(19ZDA32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专项“海外涉华舆论场研究”(2023WKYXZX007);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科研项目“我国前沿科技领域公开发表论文和宣传报道引发美西方借此炒作或打压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 徐迪, 女,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黄莲丽, 女, 助理研究员; 郑韶武, 男, 副总编辑。

“美国优先”的理念, 意图通过强化国内制造业、减少贸易逆差以及加强边境控制等措施来振兴美国经济。此外, 特朗普政府还承诺将继续加强对中国的制衡, 尤其是在技术和知识产权领域, 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

在国内政治层面, 美国的党派之争日益激烈, 对华政策成为党派竞争的关键议题之一。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 不仅反映了各自政治理念的差异, 也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6] 美国政府内部对华强硬立场的形成部分源于国内政治中“中国威胁论”的广泛传播^[7], 该论调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构成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根本挑战。^[8]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秩序的影响不仅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也深刻影响了美国国内的公共舆论和政治生态。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2023年的最新民调数据,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仅有14%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正面看法。^[9] 在美国, 公众意见对于政府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不同党派的执政理念差异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影响, 使得民意成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公众对华舆论的研究结论不仅反映了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态势, 也成为预测未来两国关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10] 中美双边关系与全球秩序紧密相连, 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对华舆论与美国同频共振。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 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多个西方国家的双边关系日渐紧张, 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将对世界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深入探讨美国公众对华态度背后的驱动因素, 特别是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内群体偏好与党派差异, 对于理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美国公众的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 采用社会认同理论, 从群体间关系的视角观测群体内部的情感及党派分化如何影响美国公众的中国威胁感知。这不仅有助于理解紧张双边关系下的美国公众如何看待后大国竞争时代中国日益增

长的综合国力所带来的影响, 展现民意对于中国威胁的清晰和真实的认知, 也为社会认同理论关于群内偏好与群外认知的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此外, 本研究还能够从民意层面观测美国对华态度, 为多维度动态性评估中美关系走向提供合理的阐释方案。

一、文献综述

(一) 内群体偏好与中国威胁感知

社会身份是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核心概念。该理论认为, 个体一旦意识到自身从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 就会对该群体产生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不仅是个人身份的一部分,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体的行为和态度。这种认同被视为社会类别已经内化并成为社会身份的关键证据。^[11] 个体对于社会身份的正向反馈称之为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12]。内群体偏好是指个体在与他者比较的社会过程中, 将与自己高度相仿的人判定为是内群体成员, 而将差异较大的人归类为外群体成员。内群体偏好的产生受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受群体认同的强烈影响。^[13] 个体在形成内群体偏好后, 无意识或有意识地给予同一群体的其他成员更多的信任与资源分配。相比之下, 个体更倾向于对外群体成员或无明确群体身份的成员进行消极评价。^[14] 简言之, 内群体偏好指的是个体倾向于对自己所属群体持有更高的评价和支持度, 而对外群体则表现出相对较低的好感或信任程度。这种偏好并非简单的自我中心主义表现, 而是深层次的社会心理机制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通过归属感来增强自尊和社会安全感的需求。在本研究中, “美国公众”特指那些认同并归属美国这一集体身份的个体。这些个体不仅共享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 而且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发展持有强烈的支持态度。这种认同感构成了他们看待世界、评价其他国家(如中国)的基础。对于“美国公众”而言, 本研究提及的“内群体偏好”体现为他们对美国国家利益、价值观以及文化特性的强烈认同和支持。

威胁感知是指个体对其他个体或群体是否具备意图和能力对自身或所属群体造成负面影响的综合评估。^[15] 在社会交互和人类行为研究领域,威胁感知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个体对威胁的感知主要通过观察其他个体的言语、行为和非语言信号来形成,这种感知有助于个体判断自己和群体的安全和稳定程度,并决定如何应对潜在的威胁。在感知威胁的过程中,个体首先会考虑其他个体或群体是否具备意图对自己或所属群体造成负面影响。意图是指个体或群体有意识地企图或计划实施对个体或群体不利的行动。个体将通过观察他们的言辞、态度和行为来判断其意图。其次,个体还会考虑其他个体或群体是否具备能力对自己或所属群体造成负面影响。能力是指个体或群体具备实施威胁行为所需要的资源、技能和权力。个体会根据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历史行为、社会地位和资源控制情况来评估其能力。在国际关系领域,威胁感知表现为行为体对另一行为体的主观认知建构。^[16] 具体而言,本研究所讨论的美国公众认知中的中国威胁源于不同群体间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威胁感知。也就是说,在美国公众的认知中,中国的崛起被视为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现象。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和技术实力的增长,部分美国公众担心这可能挑战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中美之间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尤其是在应对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等方面。因此,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的认知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速度和方式,还受到国内政治氛围、媒体舆论导向和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进一步研究美国公众中国威胁感知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将有助于加深对国家间互动的理解,为国际冲突解决提供理论依据。

已有研究强调,群体间偏见源自分属不同群体的成员对本群体的偏爱。^[17] 当内群体偏好发生时,对外群体的感知可能会存在强烈的负面评价。^[18] 同时,过往研究发现,内群体偏好在个体衡量他国形象时会影响外群体的威胁感知。^[19] 在

群体间的互动中,当不同社会群体形成时,一个群体所拥有的资源,群体成员的行为、信念和价值观等各种特征可能会对另一个群体的存在和发展构成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是因为资源的争夺、行为冲突、信念冲突或价值观的冲突等多种原因导致的。^[20] 这种威胁的存在可能导致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对抗,需要通过有效的沟通、互动和解决冲突的机制来缓解和处理。因此,本研究假设在中美双方对峙的强竞争环境中,美国公众的内群体偏好程度会正向影响中国威胁感知,即:

H1: 美国公众的内群体偏好程度越高,对中国的威胁感知也越强烈,即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越大。

(二) 中国实力认知的中介作用

在群体间关系的研究中,内群体偏好常常与对内群体的乐观判断联系在一起。^[21] 研究表明,对外群体的蔑视并非单纯源于对外群体成员的敌意,更多的是内群体偏好的结果。^[22] 因此,表现出更强内群体偏好的美国公众可能比那些表现出较弱内群体偏好的公众更倾向于相信美国将长期保持世界霸主地位,并拥有稳定的全球主导权,从而更不可能认同和接受中国实力的发展和提升。

当讨论到中国实力认知时,实际上是在探讨美国公众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及其影响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美之间的国家实力差距逐渐缩小,这种变化是否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威胁”的认知? 群际关系研究指出,外群体的能力对外群体的整体印象产生显著影响^[23],并且研究表明,个体对外群体的能力判断与其构成的威胁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24]。具体来说,在评估中国实力的过程中,如果受访者认为中国正在快速接近甚至超越美国的地位,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感到更大的安全压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联并非绝对线性——即不是所有的受访者都会因为看到中国强大而增加其威胁感知。相反,那些能够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两国关系的人,可能会将中国的进步视为共同繁荣的机会而非零和博弈的结果。

在威胁感知的影响变量中, 群体间的实力对比能够显著影响威胁感知, 且通常位于低实力等级的群体比位于高实力等级的群体更容易感受到威胁。^[25] 这种低实力感往往不是绝对的实力高低形成的固定认知, 而是在双方抗衡时因实力波动而产生的相对差异感。例如, 由于优势一方的实力差距缩小后产生的强烈被剥夺感^[26]。在国家间关系的研究中, 类似结论也得到了验证。当个体认为自己所在国家的实力相对于其他国家处于劣势时, 他们对来自外部国家的威胁的认知会显著增强。^[27] 这种现象在国际政治中被称为威胁认知理论, 认为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感取决于其自身实力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这种认知的增强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决策过程, 推动其采取更加保护性和防御性的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安全。因此, 理解和研究威胁感知的影响对于解释国家间紧张关系的形成和演变, 以及构建稳定和平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以探讨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知与威胁感知之间的关系:

H2: 美国公众的内群体偏好程度越高, 对中国实力的认知越弱。

H3: 美国公众认为中国的实力越强, 对中国的威胁感知也越强烈, 即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越大。

H4: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实力认知在内群体偏好和对中国威胁感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具体来说, 美国公众的群体内偏好程度越高, 他们对中国国力的认知就越弱, 因此, 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小。

上述假设旨在探讨个体对他国实力认知与威胁感知之间的相互作用, 并认为个体对内群体的偏好可能通过影响对他国实力的认知, 进而影响对他国威胁的感知。

(三) 党派差异的调节作用

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 美国对外战略, 特别是对华政策, 日益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28] 美国政治极化现象与对华政策的

极端演化呈现出紧密交织的互构效应^[29]。这种特征可被视为一种新型的动态共振, 其影响超越以往的政治模式, 具有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政策含义。

在面临中国崛起等重大国际挑战时,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和行为存在明显分歧。两党阵营分庭抗礼, 执政理念的差异导致结构性的治理失调, 影响着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30] 不同政党支持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态度分化可能表现为: 共和党人往往更加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 因此他们更容易把中国视作潜在对手; 相比之下, 民主党人虽然也关注这些问题, 但更倾向于寻求合作解决方案, 并且更愿意接受全球化带来的变化。这意味着, 在面对同样的信息源时, 两个群体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例如, 对于同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报告, 共和党选民可能会将其解读为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 而民主党选民则可能看到更多合作的可能性。具体而言, 特朗普在执政期间摒弃了多边主义外交原则, 强势推行双边模式, 大打经济民族主义牌, 助推了新一轮民粹主义浪潮。而拜登执政后, 着手推进回应国内选民诉求, 对冲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影响, 重塑美国外交政策方向。^[31]

两极分化已成为当代美国政治的普遍现象。^[32] 近年来, 对威胁认知的两极分化愈发明显。共和党更关注硬安全威胁, 如中国的崛起和国际恐怖主义, 而民主党则更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国内的种族和经济不平等现象。^[33] 具体来说, 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倾向于抵触中国的崛起。^[34] 基于意识形态差异导致的观点分歧, 两党对中国的看法存在显著区隔。共和党人和意识形态保守派对中国的看法比民主党人和意识形态自由派更负面, 即保守派共和党比自由派民主党对中国看法更负面。^[35] 保守派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右翼民粹主义导致他们比自由派民主党更有可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 并支持鹰派的遏制政策。^[36] 在美国国内, 两党对华政策

的区隔持续加深公众之间的党派歧见撕裂。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深深嵌入美国的社会认知，导致美国公众对华认知出现多样化的趋势。因此，党派差异在美国公众对华态度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党派差异在美国公众对华实力认知与中国威胁感知中存在调节作用（即党派差异调节了内群体偏好透过对华实力认知作用于中国威胁感知之间的中介关系）。

为了更系统地探讨党派差异在内群体偏好、对华实力认知与中国威胁感知之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可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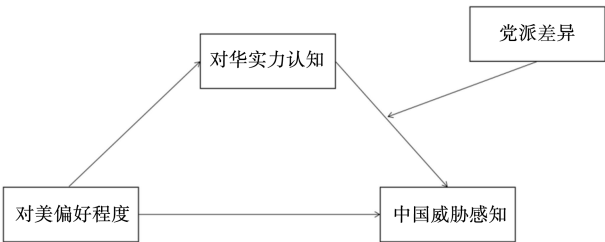


图 1 本研究的研究假设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样本数据

本研究使用教育部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暨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的“寰球民意指数”（2023）调查数据。“寰球民意指数”是一项年度执行的全球同步大型民意追踪项目，旨在系统性地收集和分析各国公众的意见和态度。本轮调查在 2022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间进行，委托知名研究机构 Qualtrics 公司执行。Qualtrics 公司的在线调查样本库由超过 9000 万注册用户组成，每两年对样本库内注册用户进行质量筛查，以确保招募到有效的参与者。为了保证调查质量，采用了唯一 IP 地址、数字指纹技术以及删除重复数据等方法进行调查质量控制。

在调查项目启动后，执行人员设置了 7 天的软启动观测期，期间通过观察软启动样本的作答时间中值，相应地设置了正式调查时的最小和最大作答时间。正式调查执行期间，依据指定问题的缺失作答情况筛选了无效样本，确保了调查结

果的整体质量。在针对美国公众的调查中，课题组共计回收了 1073 份问卷。经过数据筛选和对缺失值进行处理，课题组最终选取了 708 份有效样本进行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收集方法主要基于网络调查的非概率抽样方式。尽管这种截面数据的获取方式可能难以全面深入地描绘公众的情感态度或政治行为特征，但其在样本数量上显著超过了普通民意调查 400 个受访者的基准，赋予了其强大的代表性。此外，课题组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严格遵守科学规范，确保了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根据具体的研究议题和目标，已经广泛认可使用网络调查获取数据以进行统计分析的方法。因此，尽管本次调查所采用的数据收集方式存在其固有的局限，但仍然可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支撑和参考。样本结构见表 1。

表 1 受访者特征（N = 708）

变量	分类	受访者	
		N	%
性别	男性	355	50.1
	女性	353	49.9
年龄	18-24	30	4.2
	25-34	143	20.2
	35-44	122	17.2
	45-54	131	18.5
	≥55	282	39.8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	0.6
	初中	19	2.7
	中专/高中/技校	265	37.4
	大专/大学肄业/本科学生	153	21.6
	本科毕业	168	23.7
	研究生及以上	99	14.0
党派	共和党	322	45.5
	民主党	386	54.5

(二) 变量的定义及测量

本研究对各个变量的测量情况和编码操作进行了详细说明。为了确保符合研究目的, 并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对原调查中的部分问题进行了重新编码。以下对这些操作进行详细阐述。

1. 自变量

内群体偏好: 内群体偏好通常通过个体对本群体的好感与对外群体好感的差值来测量。^[37] 因此, 计算规则为: $\text{Ingroup favoritism} = \text{Favorability of the ingroup} - \text{Favorability of outgroups}$ 。在本研究中, 对本群体的好感指的是美国公众对自身国家的好感程度, 而对外群体的好感则是指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程度。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内群体好感: 询问受访者对美国的整体印象, 评分范围为1~10, 重新编码为5级量表(1=1~2; 2=3~4; 3=5~6; 4=7~8; 5=9~10)。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对自身国家的好感程度越高。

外群体好感: 询问受访者对中国的整体印象, 评分范围为1~10, 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对外群体偏好程度越高。

内群体偏好计算: 将受访者对美国的好感度减去对中国的好感度的差值作为内群体偏好的对应数值。^[38] 数值越大表示美国公众的内群体(美国)偏好程度越高。

2. 因变量

中国威胁感知: 询问受访者“您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力日益强大, 对您的国家有利还是不利?” 评分范围为1~5, 其中1=非常不利, 5=非常有利。为了使数值越大表示威胁感知越高, 对数据进行重新编码, 使得1=非常有利, 5=非常不利。

3. 中介变量

中国实力认知: 通过以下五个题项测量受访者对中国在不同领域的实力认知, “中国在政治影响力方面是否会超越美国” “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是否会超越美国” “中国在科技水平方面是否会超越美国” “中国在军事力量方面是否会超越美国” “中国在文化实力方面是否会超越美

国”。评分范围为1~3, 其中1=中国不会超越/优于美国, 2=中国将会超越/优于美国, 3=中国已超越/优于美国。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对中国的实力越认可。该综合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 α 为0.785, 主成分因子分析提取出一个因子, KMO指数为0.821, 累积解释方差53.86%,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4. 调节变量

党派差异: 询问受访者“在当今政治环境中, 您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 其中赋值1=共和党, 2=民主党。在数据筛选中已剔除其他拒绝回答所属党派的样本。

5. 控制变量

本研究考虑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具体编码如下。

性别: 1=男性, 2=女性。在受访者中, 男性有355人, 女性有353人。

年龄: 分为6个等级, 评分范围为1~6, 其中1=18-24岁, 2=25-34岁, 3=35-44岁, 4=45-54岁, 5=55-64岁, 6=65岁及以上。

受教育程度: 使用1到6来表示从小学及以下到研究生及以上的6个不同等级。评分范围为1~6, 其中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中专/技校, 4=大专, 5=本科, 6=研究生及以上。

本研究使用SPSS26.0进行数据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并利用Hayes(2017)^[39]开发的PROCESS插件对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进行检验。

三、研究发现

(一) 美国公众的中国威胁感知

本研究关注不同社会人口属性的美国受访者对中国的威胁感知是否存在差异。通过T检验和方差分析, 探讨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美国公众中国威胁感知的影响。T检验结果显示, 不同性别的受访者在中国威胁感知上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女性的中国威胁感知($M=3.02$, $SD=1.32$)显著高于美国男性($M=3.28$, $SD=1.07$), $t=-2.96$, $p<0.01$ 。这一结果表明, 女性受访者对中国威胁的感知更为强烈, 可能与性别

在风险感知和安全关切方面的差异有关。女性在面对潜在威胁时可能更加敏感，这与以往研究中关于性别在风险感知方面的发现一致。^[40]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的美国受访者在对中国威胁感知上存在显著差异（ $F(3, 703) = 28.53, p < 0.01$ ）。具体来看，55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国威胁感知最高（ $M = 3.67, SD = 1.20$ ），而35~44岁的受访者中国威胁感知最低（ $M = 2.64, SD = 1.10$ ）。这一结果表明，年龄较大的受访者可能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更为敏感，这可能与他们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生活经验有关。年龄较大的受访者可能更倾向于基于历史经验和长期观察来评估潜在威胁，而年轻受访者则可能更关注当前的即时信息和短期影响。^[41]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美国受访者在对中国威胁感知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并不是影响中国威胁感知的主要因素，可能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或个人经历有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可能在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上更具优

势，但这种优势并未显著影响他们对中国威胁的感知。^[42]

本研究使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了各核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表 2 可知，内群体偏好与中国威胁感知（ $r = 0.423, p < 0.01$ ）和中国实力认知（ $r = -1.172, p < 0.01$ ）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内群体偏好（ $r = -0.198, p < 0.01$ ）、中国威胁感知（ $r = -0.254, p < 0.01$ ）与党派差异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表明，美国公众的中国威胁感知较为复杂，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为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提供了基础。

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与内群体偏好、对华实力认知、中国威胁感知和党派差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因此，在后续的进一步分析中，将这些相关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表 2 各核心变量相关性矩阵

	Mean	SD	1	2	3	4
内群体偏好	2.17	1.59	1			
对华实力认知	1.57	0.51	-1.172**	1		
中国威胁感知	3.15	1.20	0.423**	-0.231**	1	
党派差异	1.54	0.50	-0.198**	-0.010	-0.254**	1

注：** $p < 0.01$ 。

（二）直接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假设 1，本研究以中国威胁感知为因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内群体偏好对中国威胁感知的影响效果。模型 1 仅测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威胁感知，模型 2 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内群体偏好变量。处理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3 显示了内群体偏好对中国威胁感知的回归结果。在模型 1 中，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对中国的威胁感知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只有年龄的影响显著（ $\beta = 0.300, p < 0.001$ ）。模型 1 的解释力为 11.5%（ $R^2 = 0.115$ ）。在模型 2 中，加入内群体偏好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至 22.6%（ $R^2 = 0.226$ ）。内群体偏好对中国威胁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beta = 0.269, p < 0.001$ ）。这表明，内群体偏好在中国威胁感知中的作用显著，假设 H1 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

表 3 内群体偏好作用于中国威胁感知的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因变量	中国威胁感知		
自变量	内群体偏好		0. 269 (0. 027) ***
控制变量	性别	0. 134 (0. 087)	0. 119 (0. 082)
	年龄	0. 300 (0. 033) ***	0. 188 (0. 033) ***
	教育程度	-0. 035 (0. 037)	-0. 061 (0. 035)
R^2		0. 115	0. 226
观测个案数		708	708

注: *** $p < 0. 001$; ** $p < 0. 01$; * $p < 0. 05$;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内群体偏好的显著影响:内群体偏好对中国威胁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美国公众对自身国家的偏爱程度越高,他们对中国威胁的感知也越强烈。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H1,支持了内群体偏好在中国威胁感知中的重要作用。(2) 模型解释力的提升:相较于模型 1,模型 2 中加入内群体偏好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这表明内群体偏好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可以显著提升模型对中国威胁感知的解释能力。(3) 控制变量的影响: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对中国威胁感知的影响最为显著,年龄较大的受访者对中国威胁的感知更高。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相对较弱,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威胁感知。

通过对直接效应的检验,本研究验证了内群体偏好在中国威胁感知中的显著作用。内群体偏

好不仅显著影响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的感知,而且显著提升了模型的解释力。这一结果为理解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感知的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探讨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作用,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一复杂关系。

(三) 中介效应检验

鉴于内群体偏好与对华实力认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本研究使用 Hayes 的方法检验对华实力认知在内群体偏好与中国威胁感知之间的中介效应。为了控制潜在的混杂因素,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纳入控制变量。通过使用 Process 3. 4 宏程序中的 Model 4,采用带有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方法进行了 5000 次重复取样,并计算出 95% 的置信区间。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中介效应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	95%置信区间	
			SE	下限	上限
内群体偏好 -对华实力 认知-中国威胁感知	总效益	0. 2691	0. 0268	0. 2166	0. 3217
	直接效应	0. 2544	0. 0266	0. 2021	0. 3067
	间接效应	0. 0147	0. 0063	. 0044	0. 0288

直接效应结果显示，内群体偏好对中国威胁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beta=0.2544$ ， $SE=0.0266$ ，95% $CI=[0.2021, 0.3067]$ ）。这表明，即使不通过任何中介变量，内群体偏好仍然对中国威胁感知产生显著影响。

中介效应分析得知，内群体偏好对于对华实力认知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t=-3.3805$ ， $SE=0.0127$ ，95% $CI=[-0.0679, -0.0180]$ ）。这表明，内群体偏好越强，受访者越倾向于低估中国的实力。假设 H2 得到验证。对华实力认知对中国威胁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t=4.3742$ ， $SE=0.0785$ ，95% $CI=[0.1892, 0.4973]$ ）。这表明，受访者对中国实力的认知越强，他们对中国威胁的感知也越强烈。假设 H3 未得到验证，但对华实力认知对中国威胁感知的影响方向与预期一致。

根据表 4 的结果，对华实力认知在内群体偏好与中国威胁感知之间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为 $[0.0044, 0.0288]$ ，该区间不包含 0。这说明，对华实力认知在内群体偏好与中国威胁感知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换言之，内群体偏好一部分直接作用于中国威胁感知产生影响，另一部分则通过影响对华实力认知间接影响中国威胁感知。假设 H4 成立。通过对中介效应的检验，本研究验证了内群体偏好在中国威胁感知中的多重影响机制。内群体偏好不仅直接作用于中国威胁感知，还通过影响对华实力认知间

接影响中国威胁感知。内群体偏好越强，受访者越倾向于低估中国的实力；而对中国实力的认知越强，威胁感知也越强烈。

（四）党派差异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采用 PROCESS v3.4 插件的 Model14 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旨在探究党派差异是否调节内群体偏好通过内群体偏好影响对华实力认知的过程。表 5 的结果显示，对华实力认知与党派差异的交互作用在预测中国威胁感知方面具有显著影响（ $\beta=-0.3991$ ， $p<0.01$ ）。此外，在整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中，index 数值为 0.0171，95% 的置信区间为 $[0.0024, 0.0370]$ ，置信区间未经过 0，因此代表党派差异对整个中介模型具有显著的调节影响。由此，假设 H5 得到证实。

为进一步直观展示党派差异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绘制了简单斜率图（见图 2），分别展示了共和党 and 民主党受访者的对华实力认知与党派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威胁感知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共和党还是在民主党受访者中，对华实力认知与党派的交互作用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具体而言，根据不同党派的调节间接效应计算结果，共和党被中介的间接调节效应并不显著（95% $CI=[-0.0034, 0.0212]$ ，区间包括 0），而民主党被中介的调节效应占比为 10.7%，中介效应的效应值为 0.0242（ $SE=0.0089$ ，95% $CI=[0.0089, 0.0432]$ ）。

表 5 调节效应模型的结果

变量	方程 2（因变量：对华实力认知）				方程 1（因变量：中国威胁感知）			
	β	t	95%CI		β	t	95%CI	
内群体偏好	-0.0429	-3.3805***	-0.0679	-0.0180	0.2270	8.5693***	0.1750	0.2790
党派差异					0.1933	0.7782	-0.2944	0.6809
内群体偏好×党派差异					-0.991	-6584**	-0.6939	-0.1044
对华实力认知					0.2338	0.7782	-0.2319	0.6996
R ²	0.0415				0.0072			
F 值	F（4，705）= 7.6053***				F（1，700）= 7.0674***			

注：*** $p<0.001$ ；** $p<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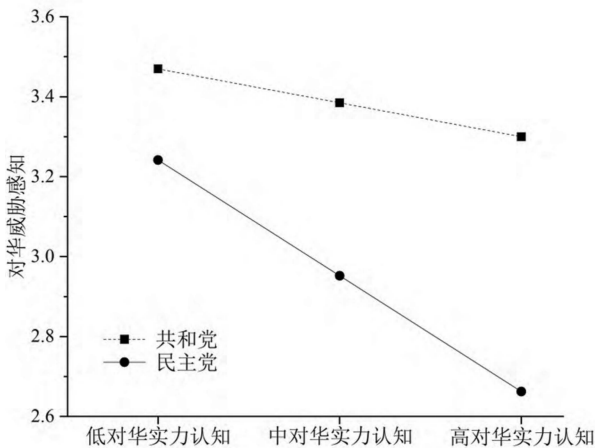


图2 党派差异对内群体偏好与对华实力认知的调节作用

通过对党派差异的调节效应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揭示了党派归属在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感知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党派归属会影响个体如何看待内群体偏好以及这种偏好如何转化为对华实力的认知。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受访者中,虽然对华实力认知与党派的交互作用均表现为显著的负向调节,但在具体中介效应上存在差异。共和党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民主党的中介效应占比较小,但仍具统计意义。事实上,民主党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并非完全基于务实立场,而是将中国视为唯一有意图并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43] 研究发现,根据不同党派背景调整沟通策略能显著提高信息传递的效果。特别是对于民主党支持者而言,通过解释内群体偏好如何影响对华实力的认知,能够更有效地改变他们对中国威胁的看法。这种方法有助于民主党选民更好地理解中美合作的重要性,进而减少不必要的敌意和误解。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从群体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美竞争背景下,美国公众的内群体偏好如何显著影响他们对中国威胁的感知。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影响呈现正向关系,即内群体偏好越强,对中国威胁的感知也越高。此外,美国公众的内群体偏好通过其对华实力认知进一步作用于对中国威胁的理解,对华实力认知带来了正向中介效应。党派差异也在内群体偏好通过对华实力认知作用于中国威胁

感知的中介效应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尤其是对民主党选民的中国威胁感知呈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在先前的研究中,外群体实力的提升通常会增强个体对外群体的威胁感知。但本研究发现,美国公众对中国实力认知越强,对其威胁感知反而越弱。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加以解释。

一是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来看,中美两国公众共享群体认同的形成有助于消解负面感知。当两国存在显著群体认同差异时,无论外群体的实力如何,公众都会感知到群体间的差异性以及与之伴随的强威胁感知。^[44] 中国积极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群体间的界限,形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宝贵共识,由此构建了共有的内群体认同的心理基础。中国实力的增强为全人类(包括美国公众)带来了共同利益,这符合“命运与共”“共赢发展”的价值期待。因此,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他者”认知逐渐转变为人类命运与共的“我们”认知,削弱了美国公众认为中国是截然不同的外群体的感知,将中国纳入“我们”的“内群体”认知范畴。

二是从群体互动关系的视角来看,中美合作的群体关系为消解美国公众负面情绪提供了依据。在社会互动中,合作和竞争两种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合作型关系中的个人成功与其他成员的成功紧密联系,双方互为基础,因此合作者间的关系通常和谐融洽;相反,在竞争型关系中,个人的成功建立在他者的失败之上,双方在竞争中关系趋于消极对立。^[45] 当合作或竞争关系从个人层面扩展到群体层面时,便形成了群体间的合作与竞争。^[46] 该调查执行期间,时任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一种复杂的双重策略:一方面,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遏制、打压与威慑政策;另一方面,又表达了避免冲突的意愿,试图在某些领域寻求中美合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宏观经济、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全球性议题上,中美之间仍存在一定层次的合作。这些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助于解决全球性挑战,也为两国关系的稳定

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在经济、科技、公共卫生等方面为全球发展贡献了独特的智慧和力量。美国公众逐渐意识到,在某些关键领域,中美关系的合作性质超过了竞争性质。例如,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新的动力,展示了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可能性。而且,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对美国经济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美国公众秉持的实用主义价值观进一步推动了他们以更积极、正面的态度看待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47]

三是从党派差异的视角来看,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与对华战略调整深刻影响着公众的对华态度。研究表明,在民主党选民中,党派的调节作用显著增强了中国实力认知对中国威胁感知的负向影响,而共和党选民则未表现出类似的调节效应。这意味着美国公众在党派对中国实力认知的调节作用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民主党的党派差异与中国实力认知的调节作用显著,随着中国实力认知的增强,中国威胁感知会进一步削弱;而共和党选民则不论中国实力提升与否,均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与美国国内党派竞争的政治极化现象相吻合,即共和党在对华态度上比民主党更为消极负面。共和党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出更为突出的意识形态偏见、冷战思维以及保护主义态度,更加强调渲染“中国威胁”。^[48]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对抗性质,而非基于竞争的原则。这种政策取向不仅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共和党选民的对华认知。然而,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新的趋势。这不仅体现了美国政策调整的复杂性,还反映了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处理大国关系的重要性。事实上,拜登政府已多次强调其对华政策包含三个维度:竞争、合作和对抗。这种多维度的政策立场预示着美国与中国将进行长期持续性的抗衡式交锋。^[49]从这个视角来看,民主党更倾向于认为在合作基础上的中美竞争对美国并不是全然的威胁,拜登政府

并未采取全方位的对华遏制和打压政策。具体而言,民主党在对华问题上的政策取向更多地体现了实用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特点。拜登政府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和多边机制来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和挑战,这与共和党的单边主义和对抗性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民主党选民在这种政策背景下,更容易接受中国实力的增强,并将其视为一种可以通过合作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机会,而不是单纯的威胁。

本研究深入探讨美国公众对本国内群体偏好与中国威胁感知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内群体偏好与威胁感知之间的影响机制和可能的解释路径。借助美国公众民意调查数据,研究初步阐释了对华实力认知在影响美国公众中国威胁感知的重要作用,为深入理解中美双边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对于民意波动如何反作用于国家政策制定的解释和分析,仍然存有极大的讨论空间,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理论辨析。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美关系中既存的结构变化已较难逆转,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只能被动接受现状。在充分了解两国民意取向的基础上,仍然有可能通过合理的政策调整 and 对话机制,使“中美竞争”的边界趋向合理。探讨群体间心理对中国威胁感知的影响,必须将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纳入考虑,以获取精确、规律性的经验数据。这也表明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 and 深化这一研究,以便更准确地预测 and 解析中美关系的走向。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下,中美两国如何调整 and 优化各自的外交政策,以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仍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究的关键性议题。

参考文献:

- [1] 王浩. 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 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2009~2018) [J]. 当代亚太, 2019, (1): 38-55.
- [2] 曹玮. 选边还是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亚太国家选择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 (2): 47-77.
- [3] Friedberg, A. L. (2018). Competing with China. *Survival*,

60 (3): 7-64.

[4] O'Rourke, R. (2021). *Renewe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mplications for defense—issues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5] 达巍. 中期选举后美国外交的三种延续 [J]. 当代美国评论, 2022 (4): 14-25.

[6] 杨楠. 在美国中期选举年重思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J]. 世界知识, 2022 (21): 23-25.

[7] Antony, J. B. 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trieved May 26, 2023, from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8] 吴心伯. 探索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 [J]. 国际问题研究, 2023 (2): 42-57.

[9] Silver, L., Huang, C., Clancy, L. & Fagan, M. Americans are critical of China's global role—as well as its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Pew Research Center. Retrieved April 12, 2023, from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3/04/12/americans-are-critical-of-chinas-global-role-as-well-as-its-relationship-with-russia>

[10] “寰球民意”课题组. 百年变局中的“寰球民意指数”调查报告 (2020)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7): 143-148.

[11] Stroebe, K., Lodewijkx, H. F. M. & Spears, R. (2016). Do unto others as they do unto you: Reciprocity and social identification as determinants of ingroup favoritis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 (6): 831-845.

[12] Tajfel, H. (1974).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behavior.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3 (2): 65-93.

[13] Aberson, C. L., Healy, M. & Romero, V. (2000). In-group bias and self-esteem: A meta-analysi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4 (2): 157-173.

[14] Stets, J. E. & Burke, P. J. (2000).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3 (3): 224-237.

[15] Davis, J. W. (2000). *Threats and promises: 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Baltimore, MD: JHU Press.

[16] 夏厦. 从威胁认知视角解析伊朗核危机 [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8 (2): 52-60.

[17] Balliet, D., Wu, J. & De Dreu, C. K. (2014). Ingroup favoritism in cooperation: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0 (6): 1556-1581.

[18] Voci, A. (2006). The link between identification and in-group favoritism: Effects of threat to social identity and trust-related emo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5 (2): 265-284.

[19] Zhai, Y. & Yan, Z. (2023). Political ideology, ingroup favoritism, and conspiratorial thinking: Patriotism, nationalism, and COVID-19 conspiracy theori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126 (4): 1784-1802.

[20] 张婧, 冯江平, 王二平. 群际威胁的分类及其对群体偏见的影响 [J]. 心理科学进展, 2009 (2): 473-480.

[21] Goleman, D. J. (1989). What is negative about positive illusions? When benefits for the individual harm the collective.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8 (2): 190-197.

[22] Ahmed, A. M. (2007). Group identity, social distance and intergroup bia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8 (3): 324-337.

[23] Brambilla, M., Sacchi, S., Rusconi, P., et al. (2012). You want to give a good impression? Be honest! Moral traits dominate group impression form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1 (1): 149-166.

[24] Zhang, Q. (2015). Perceived intergroup stereotypes, threats, and emotions toward Asian American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6 (2): 115-131.

[25] Stephan, W. G., Renfro, C. L. & Davis, M. D. (2008). The role of threat in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Wagner, U., Tropp, L. R., Finchilescu, G. & Tredoux, C. (eds.). *Improving intergroup relations: Building on the legacy of Thomas F. Pettigrew*.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55-72.

[26] Stephan, W. G., Boniecki, K. A., Ybarra, O., et al. (2002). The role of threats in the racial attitudes of Blacks and Whit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 (9): 1242-1254.

[27] 庞琴. 中美权力变化与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的认知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 (7): 69-96.

[28] 王浩. 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 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2009~2018) [J]. 当代亚太, 2019 (1): 38-55.

[29] 张文宗. 美国政治极化与对华政策的极端化 [J]. 和平与发展, 2020 (2): 40-55.

[30] Friedrichs, G. M. & Tama, J. (2022). Polarizat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Key debates and new finding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9 (5): 767-785.

- [31] 韦宗友, 张歆伟. 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 [J]. 美国研究, 2021 (4): 93-109.
- [32] McCarty, N. (2019). *Polarization: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3] Smeltz, D. (2022). Are we drowning at the water's edge? Foreign policy polarization among the US public.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9 (5): 786-801.
- [34] Zhai, Y. (2023). Outgroup threat, ideology, and favorable evaluations of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s to COVID-19. *Current Psychology*, 42 (3): 2176-2185.
- [35] Gries, P. H. & Crowson, H. M. (2010). Political orientation, party affiliation, and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5 (3): 219-244.
- [36] Gries, P. H. & Crowson, H. M. (2012). God, guns, and ... China? How ideology impacts American attitudes and policy preferences toward 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2 (1): 1-40.
- [37] Brewer, M. B. (1979). In-group bias in the minimal intergroup situation: A cognitive-motivational 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6 (2): 307-324.
- [38] Irwin, D., Mandel, D. R. & MacLeod, B. A. (2023). American and Chinese public opinion in an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group bias and threat percep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2 (140): 171-190.
- [39] Hayes, A. F. (2017).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40] Byrnes, J. P., Miller, D. C. & Schafer, W. D. (1999). Gender differences in risk taking: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 (3): 367-383.
- [41] Kenski, K. & Stroud, N. J. (2006). Connections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political efficacy,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0 (2): 173-192.
- [42] Lau, R. R. & Redlawsk, D. P. (2006). *How voters decid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election campaig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3] Chan, T., Harburg, B. & Mahbubani, K. America can't stop China's rise; And it should stop trying. Retrieved September 19, 2023, from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9/19/america-cant-stop-chinas-rise>
- [44] 徐迪, 李晓川. 中美科技实力比较及对中国威胁认知研究——基于美国公众民意调查数据的分析 [J]. 情报杂志, 2023 (1): 66-74.
- [45] 佐斌, 温芳芳, 吴漾等. 群际评价中热情与能力关系的情境演变: 评价意图与结果的作用 [J]. 心理学报, 2018 (10): 1180-1196.
- [46] Collier, P., Hoeffler, A. & Rohner, D. (2009). Beyond greed and grievance: Feasibility and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61 (1): 1-27.
- [47] Drezner, D. W. (2008). The realist tradition 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6 (1): 51-70.
- [48] 刁大明. 2022 年美国中期选举及其政治与政策影响 [J]. 美国研究, 2022 (6): 32-57.
- [49] Campbell, K. M. & Sullivan, J. (2019).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98 (2): 96-110.

[责任编辑: 高辛凡]